

百年革命史迹 | 事件篇

怡和杠棒工人血案

抗战时期,由于日本军队的封锁,新怡和纱厂近7000纱锭的花衣包和棉纱以及1200台布机的成品布匹,全靠黄浦江水道由杠棒工人搬运和装送。杠棒工的工作不但时间长,劳动强度高,而且十分危险,一不小心就会从跳板上跌落。杠棒工每天踩着跳板把原料卸在码头上,又把成品扛上运输船。杠棒工人们一天到晚还不能求得温饱。不但在经济上受尽剥削,而且杠棒工人在厂内毫无地位,他们不属厂内正式工人,以包工计件形式为怡和厂装卸成品和原料,两个工人合扛一包500斤的花衣,厂方只付给1角8分钱作为报酬。为此,杠棒工人要求资方提高酬金,经斗争,资方同意把计件工资提高到每包2角2分,但仍低于外厂同行的每包2角4分的酬金,杠棒工人要求达到同行酬金标准,遭厂方拒绝。

1941年4月14日,新怡和纱厂全体杠棒工人为了增加酬金至每包2角4分,举行罢工,致使该厂的成品在码头上堆积如山,原料船上的花衣包也无法卸下。

15日,厂内原棉告罄,再不运来将停产。当晚,资方见杠棒工人已经离厂,迅速动用由中外籍职员、临时雇工组成的“临时运输队”,把花衣包

从码头抢运进车间,以保证棉纺生产的需求。厂方同时下令解雇所有杠棒工人,不准他们再进入工厂。

16日晨,30多名杠棒工人混在上早班的工人中进了厂,还有10多名被阻拦在厂门外。已进厂的杠棒工人狠揍印度门警,并打开大门,放工友进厂。厂方报警,榆林路、格兰路(今隆昌路)、提篮桥3个巡捕房出动100多名探捕,把几十名杠棒工人团团围住,用警棍殴打驱赶。杠棒工人拾起木棍、铁棒做武器,奋起自卫。在激烈搏斗中,警方开枪镇压,三名工人倒在血泊中,30余名工人受伤,其中有重伤,酿成了“杠棒工人血案”。

血案震惊了上海及全国,4月17日,中共中央机关报《新华日报》刊登了新怡和杠棒工人伤亡的消息。

同日,《申报》以“怡和惨案,工人伤亡”为题,报道了事件真相。《中华日报》也于17日撰文“吁请社会依法惩办肇祸的该厂经理”。

血案引起新怡和全厂工人的愤怒和抗议,地下党组织审时度势,做出了正确决策,布厂、麻厂、纱厂的工人相继加入了罢工斗争的行列,提出了复工的10项条件,4月29日,劳资双方达成14条复工协议,罢工斗争胜利结束。

▲《申报》1941年4月17日报道了新怡和杠棒工人的罢工斗争

杨树浦发电厂工人的“逃警报”斗争

抗日战争后期,因美军飞机对上海日本军事设施的轰炸,市民特别是沪东工人对日本占领者的斗争,以“逃警报”的形式发展到高潮。

由于上海是日军侵略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根据地,日军的许多重要给养,都是在上海生产、储存和转运的,所以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反攻,必然要对上海采取军事行动。1944年6月以后,美军经常派飞机进行高空侦察,进而开始轰炸军事目标。上海的空袭警报几乎天天都有,轰鸣响声不绝于耳。

1944年7月6日凌晨,美军B29轰炸机第一次向上海投掷炸弹。发电厂是上海动力的心脏,自然成为美军轰炸的首选目标。

11月11日上午,美机轰炸了杨树浦发电厂,10枚重磅炸弹命中电厂,两名锅炉工被炸身亡。驻厂日本海军陆战队立即封锁厂区,不让工人

外出。电厂被炸后,全厂一片混乱。上海地下党认为必须首先保证工人的生命安全,遇有空袭,组织工人立即离厂躲避,决定通过领班向厂方提出:给死难工人家属发抚恤费,空袭时允许工人出厂躲避,发给生活补贴等三个条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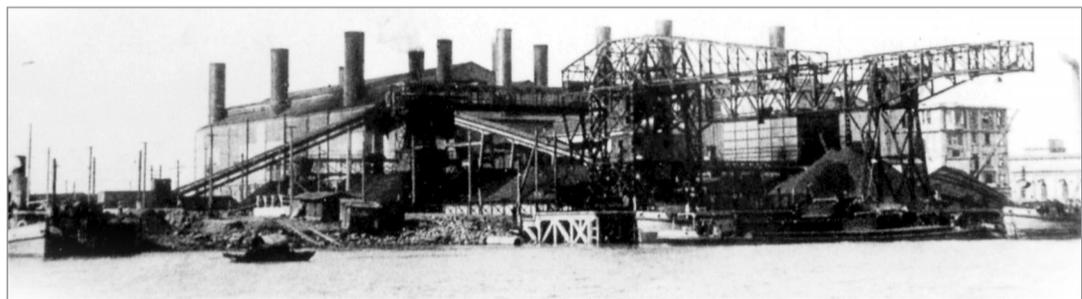
21日,美机又来轰炸。上午10时左右,警报响起,工人们纷纷离开车间,蜂拥至大门,然后迅速打开大门,冲出厂区,分散隐蔽在离厂较远的安全地带。午后警报解除,仍不见工人回厂。日本军方催促迅速发电,日本资方害怕停电导致生产瘫痪,被迫答应工人的要求。

从此,每逢空袭警报响起,厂里就打开大门放工人出厂躲避。警报解除后,凡回厂上班的,加发三天工资。如有被炸伤的,养伤期间的工资照发,医药费由厂方负担,对遇难者发给相当于本人20年工资的抚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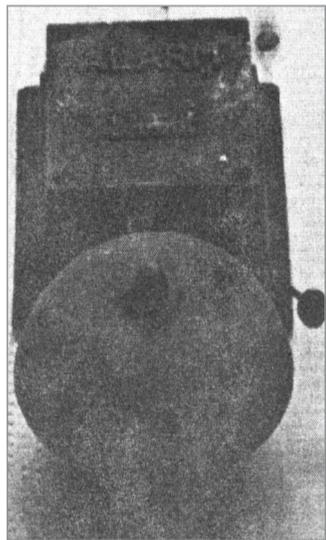
金。

面对日益频繁的空袭警报,工人们“逃警报”斗争也愈演愈烈,面也愈来愈广,从电厂、船厂波及到纺织业、制造业。对此,沪东地下党向各厂党支部布置任务,各厂纷纷向日本人提出,空袭时要放工人出厂,离厂期间工资照发,发生伤亡厂方负责抚恤。从这以后,凡遇警报,沪东各工厂工人就冲出厂门,使日本人无法进行正常生产。工人们还利用“逃警报”将生产工具带出厂外。凡此,只要空袭警报一响,党员和积极分子就带领工人外出“逃警报”。

不断的空袭警报,使敌占工厂的军工生产实际上陷于停顿、半停顿状态。党组织采取“逃警报”的斗争方式,既保护了工人群众的生命安全,又打击、拖延了敌人的军火生产,同时还为工人争取到了非常时期的经济利益。



▲上世纪40年代的杨树浦发电厂



▲逃警报斗争时期的图

(四) 逃警报 冲出厂去

一九四五年,日本帝国主义失败已在旦夕。地下党利用美机前来轰炸的时机,发动全厂工人展开斗争,更地拖住日本侵略者的后腿,进一步动摇它的统治。

一天中午,沙玉琳在船坞西一个工具间里面召集了个工人秘密开会,窗户用破衣服挡住,门口有人“望风”。

沙玉琳对工人讲:“我们这里是军事生产,为了同胞了抗日的亲人们,做有骨气的中国人,我们要想各种办法拖延生产,配合抗日大军,把敌人围在原地受缚。”

▲杨树浦发电厂和上海船厂史料中关于逃警报斗争的记载

组建沪东工人地下军配合新四军收复上海



张志洪(又名史非)
中共沪东重工业委员会委员、沪东重工业系统工人地下军负责人

1944年10月,为迎接抗战的胜利,配合新四军收复上海,市工委决定在沪东裕丰、大康、同兴等纱厂和英联、东华、丰田、亚细亚等机器厂的工人中,秘密开展组织沪东工人地下军的工作。沪东工人地下军分为纺织业和机器业两个分队。纺织业分队有20余名地下军战士,机器业分队有10余名战士。

地下军初步组织起来后,首要问

题是尽快从敌人手里夺取武器,武装自己。同兴纱厂党支部书记徐国仁听说日本人在清花间的地弄里藏有枪支,决定亲自去探个虚实。1945年4月21日,他乘黑夜进了地弄,发现那里藏有7支“三八”式步枪,1挺捷克式轻机枪,还有数十发子弹和两把刺刀。党组织研究决定设法取出。经过周密布置,徐国仁在大康、裕丰纱厂八、九人组成的地下军小分队接应下,将这批武器偷偷取出,先埋藏在一个工人家的祖坟里。后来,这批武器被秘密运往新四军。

地下军从日商武田药厂(现宁武路226号)地下党员那里得知,该厂名义上是药厂,实际上是在制造军用燃烧弹。党组织要地下军设法夺取一部分来支援新四军。经过侦察,了解到该厂晚间只有日本大班一家住在楼上,楼下有两名印度人看门。经过缜密策划,1945年8月初的一天晚上,4名地下军战士趁着夜色,骑自行车来到弹药库房,由两名队员在周围警戒,两名队员敲开了大门,警告印度门卫:“我们是x部队的,要买4箱燃烧弹派急用场。”印度人一见慌了手脚,结结巴巴地说:“这个不卖,大班就在楼上。”地下军分队长张志洪便亮出了

手枪和手铐说:“今天不卖也得卖,日本人已经完蛋,识相点。”最后两个印度人只得乖乖地提出了4箱燃烧弹(计320枚)。四人兵不血刃,把4箱燃烧弹绑在自行车上,很快消失在夜幕中,胜利地完成了任务。后来,这批燃烧弹很快被运到了青浦新四军淞沪支队。

还有一次,2名地下军战士骑自行车化装出动,先后从驻守在平凉路桥等处的伪警察手中缴获了两支枪,用以武装自己。

地下军的另一个任务,就是打击日伪汉奸,开展政治攻势,警告工贼走狗,不要为虎作伥。

沪东一些纱厂的工人地下军还为新四军进上海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,包括侦察敌情,熟悉本地区的地形等。还在抗战胜利前夕及抗战胜利的时刻,秘密张贴和散发了大量标语、传单。

后来,由于形势发生了变化,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,垄断了中国战区日军受降的权力,还勾结伪军阻止八路军、新四军接受日伪的缴械投降和进军京沪等大城市。1945年8月21日,中共中央下达了停止起义的电令,上海地下党工委于同年9月及时结束了工人地下军的活动。



▲宁武路226号,原日本武田药厂仓库。1945年夏,沪东地下军曾在此夺取燃烧弹运送给新四军淞沪支队